

元杂剧中英雄托梦复仇的文化意蕴

王利娜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元杂剧中的英雄托梦复仇行为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英雄强烈的功业心造成了其死后鬼魂不同于小人物鬼魂的生命意识;元代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造就了英雄强烈的复仇意识,剧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观众的审美趣味也对其有深刻的影响,而鬼魂托梦意识的形成追根溯源来自于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鬼魂信仰文化。

【关键词】元杂剧;鬼魂戏;托梦复仇;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3-0027-03

据臧晋叔的《元曲选》、隋树森的《元曲选外编》中所收录的一百六十二种杂剧中,其中有十七种涉鬼戏,而写冤鬼的就有九种。根据冤鬼生前的社会身份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英雄鬼魂,有《西蜀梦》《东窗事犯》《昊天塔》;一类为小人物鬼魂,有《窦娥冤》《神奴儿》《后庭花》《盆儿鬼》《生金阁》《冯玉兰》。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类中英雄死后鬼魂托梦复仇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蕴。

一

在鬼魂戏中,鬼魂作为角色生命延续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存在。但是冤魂生前和死后的行为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昔日雄赳赳的英豪”在被小人陷害后变作“昏惨惨的冤魂”^{[1]215};英雄生前挟人捉将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死后却凄凄惨惨魂儿荡荡悠悠“秦不管,魏不收”^{[2]411},要报仇却还只能通过托梦借他人之手才能得以实现。英雄生前死后境遇的强烈反差营造出了浓郁的悲剧气氛,也反映出了一种生命意识。生命作为英雄建功立业的根本,一旦失去就意味着英雄梦想的破灭,《西蜀梦》中的张飞、关羽,《昊天塔》中的杨令公父子,《东窗事犯》里的岳飞父子就都抒发了“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之情。

原本在人们心中刚毅勇猛、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英雄张飞,在《西蜀梦》中第三折出场时却是一个壮志难酬、感伤郁愤、悲歌慷慨的鬼魂形象。他与关羽的魂魄在赴西蜀途中相遇,唱词中充满了悲惨低沉的情调,布满了阴气森森、压抑的气氛。张飞感叹“壮志消磨,暮年折剉,今日向匹夫行伏落。”^{[3]693},言语间满是不甘。连“往常开怀常是笑呵呵,绛云也似丹脸若频婆”的大英雄关羽也是“卧蚕眉瞰定面没罗”^{[3]694},这与《单刀会》中一出场便高歌大江东去的关羽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命的终结对于他

们来说就是“一日无常万事休,壮志难酬”^{[3]706},而且他们还要经受更多的不自由,“往常真尸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元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3]706}所以张飞鬼魂一再感叹“元来咱死了也么哥,元来咱死了也么哥”^{[3]707},一朝命陨,沧海桑田,怎能不令人黯然神伤。即使这样他们仍在为“服侍君王不到头”而“心暗悠悠”。

《昊天塔》中第一折出场的杨令公和杨七郎的鬼魂诉说了在和韩延寿交战过程中被困,杨七郎被潘仁美射死,杨令公触碑而亡。辽军将杨令公骨殖吊在昊天塔尖上,每日派兵拿箭射杀。其鬼魂疼痛不已托梦与杨六郎,让他前去昊天塔搭救尸首并为他们报仇之事。鬼魂也是一出场便慨叹“想着我盖世功勋,今日一旦休矣”^{[4]2120}。昔日南征北讨,做了一世虎将的杨家父子,却落得“尸陷虏庭遭箭苦,魂依沙漠和云愁”^{[4]2121}。但他们想的却还是“俺子父全忠不到头,功劳汗马一时休。可怜死战三边上,不得生封万户侯。”^{[4]2121}功业未就的遗憾似乎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命运的重视。

《东窗事犯》中讲述了岳飞率兵抗击金兵,却被朝廷的十三道诏书召回。岳飞率岳云张宪班师回朝后却被下到大理寺受审。却原来是奸臣秦桧与敌国勾结,在皇帝面前诬告岳飞企图谋反,然后将岳飞、岳云、张宪三人杀害。剧作第三折岳飞父子被害后鬼魂向高宗托梦,申明冤屈,请求高宗杀了秦桧为自己报仇。岳飞鬼魂在一上场就说出了“不能青史内标名,只落的钢刀下斩首”^{[2]411},做了个“负屈衔冤忠孝鬼”。本意镇守边庭、保家卫国的英雄,被奸臣诬告而死,一腔报国热情被抹杀。本想着“统三军永远长春”却不料“半路里拔着短筹”,不由得岳飞长叹“臣性命不若如花梢滴露,风里杨花,水上浮沤。臣统三军舍命,与四国正做敌头,将四京

收稿日期:2015-06-19

作者简介:王利娜(1989-),女,汉族,河南焦作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九府平收。不想臣扶侍君王不到头,提起来雨泪交流。想微臣盖世功名,到今日一笔都勾。”^[241]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愤。

二

英雄鬼魂虽然表达了生命的陨落致使他们功业难再的遗憾,但是佞小人的陷害导致他们生前死后境遇的巨大落差,也激起了英雄鬼魂胸中的强烈复仇火焰。鬼魂“通过他们死后顽强的行动与坚定的追求”展现了一种超越死亡的审美体验^[52]。他们托梦与他们所信任之人,诉说自己的被害经过,让他们为自己报仇雪恨,表达了一种不甘于命运的强烈反抗意识。

《西蜀梦》中张飞、关羽的鬼魂不远万里远赴西蜀,就是为了给刘备托梦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他们虽然抚今追昔,但是他们没有甘心于被小人陷害的命运,他们要奋力的抗争“千则千休;丁宁说透,分明的报冤仇。”英雄不在了,成为鬼魂的他们不能亲手将小人杀死,他们便将自己“活拿住糜芳共糜竺,阆州里张达槛车内囚。杵尖上挑定四颗头,腔子内血向成都闹市里流”^[3708]的复仇愿望托梦与哥哥刘备,让他来帮他们实现。《东窗事犯》中岳飞父子在被秦桧东窗定计诬陷致死后,岳飞鬼魂便在高宗梦中诉说怨忿。将自己复仇的之愿望寄托于高宗,“想微臣志未酬,除秦桧一命休。陛下逼逐记在心头。将缘由苦苦遗留,明明说透。把那禽兽,剮割肌肉,号令签头,豁不尽心上忧。”^[2412]希望高宗“用刀斧将秦桧市曹中诛,唤俺这屈死冤魂奠盏酒!”^[2412]《昊天塔》中杨令公和杨七郎被敌军致死,死后骨殖每日还要经受“百箭会”的煎熬。于是鬼魂托梦与亲人杨六郎,“今宵梦里将冤诉,专告哥哥为报仇。”^[42121]希望六郎盗回骨殖,替他们报冤仇。一方面英雄鬼魂坚决复仇,死而不休的精神令人振奋不已。另一方面,“鬼魂形象实际上是在人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相互抵触中完成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剧中人物的刻画,这种反应与刻画不仅是对现实生活形态的再现,而且凝聚着剧作家的主体思索。”^[6]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在其统治之下,“他们把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最尊,南人最贱。”^[1188]法律上也极为不公正“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7267]令人绝望的黑暗现实,使作者向往过去。正如马克思说的:“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助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

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8139]如果说英魂是通过托梦与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复仇愿望,那么剧作家其实就是借历史人物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借英雄的复仇来抒发自己的民族复仇情绪。《西蜀梦》的作者关汉卿、《东窗事犯》的作者孔文卿,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被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在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他们被列为北杂剧的第一期作家。因此可以推断出他们的生活的时间可能是在金末、元初,他们经历了蒙古贵族的征服战争之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深刻体验的。因此“透过魂灵托梦故事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剧作家内聚性的文化心理,即对本民族的热爱,对异族入侵的痛恨。”^[9]他们以战斗者的姿态投入到剧本创作中,以作品为武器表达着被压迫者的愤怒和不屈的反抗精神。但是剧作家对社会现实似乎又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英魂复仇的作品中,一方面,剧作家期望借助英雄坚定不移的复仇精神作为武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同时唤起民众的复仇情绪;但另一方面剧作家也抒发了一种英豪不再的感伤情怀。在英豪都能轻易死于小人之手的时代,天下苍生还能靠谁来拯救,似乎又表达着一种深深的无奈。

戏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剧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抒发自己的感情,还要兼顾到观众的审美趣味。一方面剧作中的鬼魂情节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复仇成功的结局也满足了观众的愿望。中国戏曲大都讲大团圆结尾,让观众带着满意的心理离开剧场,即使是悲剧故事,也要带上一条“光明的尾巴”。这反映了民族的“乐天”心理,或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或寄托浪漫理想,相信邪不压正,主要是中庸之道体现的“中和之美”的民族心理积淀。

《东窗事犯》中岳飞父子被杀害后,奸臣秦桧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昊天塔》里最终杨六郎和孟良盗回骨殖,并且杨六郎和杨五郎在兴国寺将韩延寿杀死,杨令公和杨七郎大仇得报。英雄生前英勇威猛、一身正气;死后冤魂凄惨悲凉,充满了悲剧气氛。这就激发了观众的对英雄惨死的同情和怜悯,但是如果就以悲剧结束,英魂复仇愿望得不到实现,奸臣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那么生活在元代那样一个民族压迫强烈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黑暗的现实里已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虚拟的舞台上内心深处的痛苦还得不到消解,那生活与他们就失去了希望可言了。著名评论家欧阳予倩说过“戏剧所供给公众的是快乐,快乐就是美的精神,而不能

供给观众以快乐,以美的精神的戏剧就不能算是戏剧”^{[10][22]}因此,这些剧作不仅要能够传达出反抗的精神,鬼魂奋力抗争后的胜利才能使观者内心产生希望和敬畏之情,满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感情和愿望,并起到一定的道德约束作用。所以,剧末“光明的尾巴”并不会减弱剧作的悲剧性,反而会对观众的情感起到弥补和净化作用。

三

鬼魂信仰文化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当面对自然灾害、疾病等不可抗力所造成的死亡威胁时,由于生产力低下、知识匮乏而无法对这些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人们,希冀在精神上可以寻求一种解脱的途径。于是人们便把一些不可解释的现象归因于“万物有灵”,认为这个世界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而在梦境中人们会看到死去的人,并和死去的人有交流。但在醒来时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从而对于死亡恐惧之情和梦境中出现景象的无法解释,使他们认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灵魂的存在,人是肉体的死亡,而灵魂可以离开肉体继续存活。《礼记·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庄子·知北游》中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王充的《论衡·讥月》中说:“鬼者,死人之精也”,《论衡·纪妖》中说:“魂者,精气也。”这种相信灵魂不死的民间信仰消解了民众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生前愿望无法实现的遗憾,同时也为文学作品中的鬼魂托梦这个意象的使用奠定了基础。鬼魂信仰文化在千百年来文化传承的过程之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理,成为了一种不成文的生活规矩,习惯性的生活方式,传统

性的生活思考,构成了波及面深广的特定的生活形态。”^[11]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开篇讲到“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积;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2][36]}也说明了鬼神信仰形成的多种原因和其对文学的影响。鬼魂形象被艺术地运用到文学作品之中,逐渐的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鬼魂戏便是这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方式之一。元杂剧作为我国戏曲成熟的标志,又处于元代那样一个冤狱横行的时代,所以在鬼魂信仰文化的影响下借鬼魂形象表达感情,反映现实,便有了大量鬼魂戏的存在。元代鬼魂戏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祭祀活动的盛行。戏曲在祭祀活动中上演,主要是演与祭祀鬼魂相关的曲目。如《西蜀梦》和《东窗事犯》可能就是在祭奠关圣帝君、岳武穆王时上演的曲目,表现了人们对于英雄的怀念和崇拜。而且《西蜀梦》《东窗事犯》和《昊天塔》中也出现了许多和祭奠相关的话语。如“咱可灵位上端然坐,也不用僧人持咒,道士宣科”“也不用香共灯,酒共果”^{[3][695]}“用刀斧将秦桧市曹中诛,唤俺这屈死冤魂奠盏酒”^{[2][412]}“到来日追斋累七,超度父亲和兄弟也”^{[4][2123]}。证明了鬼魂戏在元代的存在和祭祀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英魂托梦复仇情节的存在从宏观上讲与我国鬼魂信仰文化和元代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现实有着深刻的关系;从微观上讲与元杂剧创作者的创作心态和观众的审美趣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 [2]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汇校详注关汉卿集[M].蓝立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王学奇.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5]臧慧远.元杂剧的鬼魂戏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
- [6]刘超.试论元杂剧中鬼魂形象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蕴[M].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3(3).
- [7]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8]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 [9]高梓梅.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魂灵托梦现象[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4).
- [10]欧阳予倩.予倩论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 [1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

(下转第34页)

正如周燕芬所说：“就当前的陕西文学来讲，创作与阅读都走在了前面，滞后的恰恰是批评这一维。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已经成为促发作家再创作的强劲动力，但批评家却满足于解释作品，迎合作家，进而拔高和吹捧，缺少独立的学术品格和批评的理论力度。批评既难以触动作家，也就谈不上

指导和提升作家的创作了。”^[12]陕籍评论家们对陕籍作家言语上地的照顾，造成了批评上的滞后，生成了一种作家、评论家互谋共利的奇异状况。陕旗大军面对陕西评论界相对空白的研究现状与不痛不痒的有限指点，无疑会造成批评家无力敦促作家创作趋于成熟的恶行循环。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七周年而作[J].南方文坛,2002(2).
- [2]陈忠实,高建群.深情忆路遥 共论文化强[N].华商报,2007-7-30.
- [3]贾平凹.怀念路遥[N].南方周末,2007-11-21.
- [4]回忆路遥特辑[J].陕西文学界(增刊)(28-29).
- [5]晓雷,李星.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348.
- [6]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 [7]金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意识[C]//张立文,王俊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54-255.
- [8]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 [9]路遥.平凡的世界[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73.
- [10]杨光祖.论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J].社科纵横,2005(6).
- [11]路遥.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254.
- [12]周燕芬.文学观察与史性阐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0.

The Downside and Drawback of LU Yao's Works

WANG X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of Lu Yao's studies increasingly goes towards a narrow space. It is undoubtedly positive meaning that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Lu Yao and speak frankly defects in the works.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restore true author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of Lu Yao.

Key words: downsides; creative concept; feudal notion; accurate appraisal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29页)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Heroes' Soul Revenge by Tuomeng in the Drama of Yuan Dynasty

WANG Li-na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zhong, Shaanxi 723000)

Abstract: Heroes' soul revenge by tuomeng has a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drama of Yuan Dynasty. Fame caused the different life consciousness between heroes' ghosts and civilian ghost. Profou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Yuan Dynasty created a strong sense of revenge of heroes' soul. Playwright's creative mind and aesthetic tastes of the audience als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ghost tuomeng consciousness traced back to the ghost belief culture.

Key words: drama of Yuan Dynasty; the ghost drama; tuomeng reveng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